

再见， 牛魔王

李云雷 著



作家出版社

再见，

牛魔王

李云雷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见，牛魔王 / 李云雷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063-9683-7

I. ①再… II. ①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6968 号

再见，牛魔王

作 者：李云雷

责任编辑：李宏伟

装帧设计：申晓声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2×210

字 数：213 千

印 张：10.375

版 次：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683-7

定 价：39.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李
云
雷

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曾任《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现任职于《文艺报》。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新视野下的文化与世界》《70后批评家·李云雷卷》《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问题》《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小说集《父亲与果园》等。曾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等。

序一：云里藏着一个雷

王祥夫

有句话是，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是水。虽然这是句老话，但读云雷的小说就突然让人想起这句听上去好像很扯淡的老话，这句话因为总是被人们挂在嘴上，说来说去的结果就是没有一点点新鲜感，而读云雷的小说，突然就想起了这句话而且感觉到这句话真是很好，正好用来说云雷。云雷的小说和云雷的这个人，是很一体的，云雷的小说实践和云雷的理论主张亦是一致的。说到云雷，就不能不说到底层文学，在中国，不可否认许多精彩的文学之作都出自底层文学，云雷虽然不是第一个提出底层文学的评论家，但由于他的努力，底层文学一时间忽然风起云涌，所以说到当代文学就必绕不过底层文学也绕不过云雷。底层文学的精髓乃在于它的犀利的现实主义精神。有人说，李云雷是由批评家转小说家，其实云雷写小说更早于他的文学批评。有人说云雷是双料，那肯定是这样，评论家加小说家，二者相加

一如熠熠闪光的合金钢，二者相加又一如天上的云，云虽然轻若棉絮，里边却藏着一个雷。云雷之为，向来低调，接人待物少见他声色高扬，说到云雷，还可以用四字评之，是霭然敦厚，我以为这四个字真是用来专门说云雷的。从这四个字往文学那边引申一下，云雷的小说，我个人认为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质朴温婉”之气，他的小说让我们感受到一种青春的处子般的清静，男作家的作品原来是可以说温婉吗，我认为在中国，在男作家那里，更多的是暴戾之气，而最缺少的恰恰是温婉。云雷近期小说的语气或者说其小说的调子好像是为当下的小说宣布了一种新转折，展示一种新的画面和温情，云雷对过去的讲述和对过往深情的怀恋带动着人们转向醇和清明的生活，起码，读他的小说可以让人在短暂的时间里远离混乱无序的现实生活，可以重新知见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质朴和真诚。通过云雷的小说，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其实骨子里是拒绝时下的某种东西的，拒绝着，而又让我们不难看出他有他自己的主张和审美倾向。云雷用舒缓而动情的小说形式表达了他那个时期的个人回忆。糟粕有时候可以变成艺术，艺术有时候也可以变之为糟粕。从表面看，云雷这个时期的小说好像是没有明确的精神方向，而我以为，云雷小说的骨子里却是对时下文学“小集团主义”那种过分迷恋自我和对自己个体生活的过分渲染追求个人神话和幻想的用力一击。云雷在他的小说里表现出来的真诚感染力是巨大的。在中国，说到文学，和政治很难不是一个整体。虽是一个整体，但七八十年代自有它的温馨，云雷恰恰抓住了这个，为生活在我们这个焦虑时代的读

者带去一个又一个问候，简直就是，那个时代对这个时代的问候或者是一次奇异的造访。我们知道，读好小说其实就是在接受一个温馨的问候。我以为，云雷的小说并不靠深刻的想像力，而是靠深深扎根在我们传统而美好的精神地域——似乎无法再次抵达的地域。

我喜欢读云雷的小说，首先在于他的小说有着把自己的内在情感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力量，这必定是一种力量。这个社会只知道拼命地追求现代化而丝毫不顾惜人的价值。而云雷把这个现象反了过来，他通过小说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情感和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是多么珍贵。云雷的小说几乎都是采用着他自小就已经习惯了的视点，很奇怪的是一向关心社会生活与政治的云雷在他的这些小说里却是更加关心可以决定人的一生命运。比如我刚刚读到他的一篇新作，是写他姐姐的婚恋，小说对男女之间的追求与被追求有着十分不动声色的精彩描写，而最后小说中的姐姐却没嫁给那个整天要带着他们玩的拖拉机手而是嫁给了一个高中生。这种选择看似寻常，但分析起来，某种特殊的社会时期人们的内心向望却马上会浮现出来。在云雷的小说里没有多少想像力的雄心，这一点恰好阻止了社会带给文学的让人生厌的某种东西，所以，云雷近期的小说质地就显示得十分纯净，我喜欢这种纯净。读云雷的小说，人们总是向望那个父亲的果园，苹果花开的时节的果园又让人想到契诃夫笔下的《樱桃园》，果园情结在云雷的小说里似乎有着很重的分量。虽然不必提到那个社会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但它时时在向读者反映着整个社会，这又和

作品中年轻的主人公的青春期的微妙的情绪变化连在了一起。时下的“非虚构”这个词的出现其实是人们对中国报告文学的一种拷问，而在云雷的小说里，非虚构的影子却是靠细微而宝贵的回忆进行下去，所以读来颇为轻松而让人心里起小小的感动或惆怅之情。由于是写“过去式”——离现在并不遥远的那种过去式，云雷的小说没有受到太多的外部操纵和控制，所以他大可以舒缓他的讲述。云雷的小说创作指向了另一个方面，表达了他重新审视现实的意识和能力。也可以看作是一次对来自外部控制的对抗，作家写小说其实就是一种对抗，你如果认为作家的写作是合唱中的一个声部，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云雷近期的小说受到朋友们和读者们的好评，就在于他发掘出了他自己的“温婉醇厚”的情格储备，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云雷的小说从一出现那天开始，我们就从他的作品里听到了充满激情和个人质地的声音。

是为序。

序二：在简朴中呈现“真切”

石一枫

我和云雷认识，是在2002年前后，当时我在北大中文系读硕士，他是博士。那个年纪，我们都对文学感兴趣，但大概对于自己能否从事这个领域又并不具备信心。从刚混到一起的时候开始，云雷就是现在这种性格，宽厚平和，话不多，未言先笑。不像我，一天到晚叨叨叨，叨叨得连我都觉得自己招人讨厌。

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读过云雷的一些小说。大多篇幅不长，从情节和情绪的类型上说，也属于比较“淡”的那种。印象比较深的有一篇叫《初雪》，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大学生在日常一天里的“生活流”，并无令人惊奇的波折际遇，只是从容地记录了主人公的所见所感所想。像废名、汪曾祺以及一些日本作家的小说一样，这种小说对于读者的触动并不是金戈铁马刀刀见血的，而是像清澈的泉水一样浸润人心，不知不觉就读完了，看似没说什么事儿，咂吧咂吧又有它独特的意味——大概可以归纳成

青春的迷惘、忧愁与希望之类。后来知道云雷在本科时期的第一外语是日语，写出这样的小说也许并不奇怪。

此后大家毕业，云雷去了一家研究机构主办的学术期刊，再后来果然在文学领域里做出了突出的建树，但却并不是通过写作，而是先成为了一名批评家。他认真，持重，有好恶却不偏激，有热情却不忘却立场，因此是很适合进行文学批评与研究工作的。在那几年里，他提出了在文学界影响甚大的“底层文学”概念。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文学在“新时期”之前的发展变化主要来自于政治动荡，而在“新时期”之后，尤其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段时间里，其演进的动力就往往来自于内部产生的文学思潮或云一个又一个“文学概念”，比如教科书上反复书写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等等。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文学越发边缘化以及从事文学的人越来越不得烟儿抽，也随着艺术上狂飙突进的年代逐渐远去，文学就连这种“自娱自乐”地推陈出新的劲头儿也不大有了。可以说，“底层文学”的提法恰逢其时，它不但总结概括了相当一批作家的写作，而且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不公的程度也在日益增大的社会环境构成了呼应。在我看来，“底层文学”这个概念的价值与其说首先是艺术和思想方面的，倒不如说首先是社会层面的。当然，作为一个新产生的文学概念，它也面临着种种质疑，或者说其自身存在着某些可以再探讨的空间，比如：拥有一手“底层”生活经验的作家在写作经验上并不丰富，而造诣达到一定程度的作家又不免会“脱离生活”或云“主动背叛了原先的生活”，这种矛盾导

致了“写底层”的作品往往在艺术上遭人诟病。再比如：为“底层”而歌而呼的作者与他们的书写对象的关系，究竟是“来自底层”“回到底层”，还是停留在知识分子的同情怜悯的范畴，从而使得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攀登道德制高点的阶梯？对于这些疑问，云雷在他的文章中分别做出了答复，其基本的立场大概是：底层问题乃至阶级分化问题是客观实存的，也是惨烈而严峻的，面对这些问题，有声胜于无声，软弱甚或虚伪的良知胜于忘却良知。我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但凭借我的这点儿粗浅的理解，已经可以解决我本人对于“那一类文学是否必要”的困惑。而随着聚焦于“底层”，聚焦于中国现实的文学写作本身正在不断丰富，我想云雷也有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他的概念。

拉拉杂杂说这么多，看似有点儿跑题。毕竟，我要谈的是云雷在最近这段时间所写的一系列短篇小说，而非他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方面的贡献。但也得承认，作为批评家的云雷和作为小说家的云雷毕竟是一个人，他对于社会，对于文学的所感所思所想不仅贯彻在了他的评论文章里，也贯彻在了他的小说写作里。

参加工作之后，云雷就曾经不止一次地表述过继续写作小说的想法，但文学批评是一件耗时耗力没准儿还不讨好的事儿，加之事务繁忙，他作为作家始终没有“高产”起来。直到最近两年，或许是摸索出了一套分配时间的科学方法，或许是创作的愿望不可遏止，他相当“突然”地写出了一大批短篇小说。其中的《暗夜行路》和《三亩地》由我作为编辑，发表在了《当代》杂志上——那一期恰好是“青年作家专号”，我还跟他开玩笑说，

这是你最后一次作为“青年作家”了。《梨花与月亮》《界碑》和《再见，牛魔王》等作品则发表在《人民文学》《十月》《青年文学》等期刊上。在一段时间里，每翻开一本知名的杂志，往往都能看到云雷的作品，他的小说集《再见，牛魔王》收录了包括上述作品在内的十七个短篇小说。这些小说的篇幅都不很长，也就是一万字上下，而写作的结构、气息、特质等又相互之间多有暗合，甚至可以说是有着一脉相承之处。从过往的文学经验来看，许多致力于短篇小说的作家的系列作品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特征，这使得他们的写作——尤其是在最勤于耕耘那个文体的时期——有了非常高的辨识度。当你读到欧·亨利和莫泊桑，读到前期和后期的契诃夫，总能清晰地辨认出“就是这个味儿”，云雷在近年的短篇小说写作也是如此。每每看一个开头，就知道云雷又要以一种典型的“云雷方式”讲述一个专属于云雷的故事。

假如作家如此勤奋地致力于某一个文体，那么他在那个领域一定有着相当的心得与自信，更重要的是，他应该能够形成一种区别于前人的艺术风格。尤其是短篇小说，它不以体量和气势取胜，因为篇幅的限制，也往往承载不下太多的人物、情节乃至起承转合和机巧设计，因而作家想要找到一种独树一帜地凸显自己的途径，难度是要大于中长篇的。就像在古代诗词，五言绝句也是最难做。当代作家中，曾经涌现过许多短篇小说高手，远如孙犁、汪曾祺，近如刘庆邦、王祥夫等还在持续创作，他们既丰富和完善了短篇小说这一文体，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后来的作家“标定”了写作的范式。如何继承前辈作家的优点，是后来者需要考

虑的问题，如何突围而出，更会让后来者焦虑。而我发现，云雷在这个方面找到了独属于他的一套办法。

以我那点儿浅薄的见识，将云雷的方法总结为“真切感”或云“亲历感”。在阅读云雷小说的时候，总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故事并不是“故事”，而是生活里真实发生的事情。譬如说，《暗夜行路》讲述的是“我”和一位少女在儿时的交往，以及若干年后两人都成为了有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的历程。在描写少男少女暗夜行路的时候，云雷不像许多小说家那样，让笔触流向初省人事的孩儿们之间的朦胧情愫（这是一个套路，哪怕写得再“干净”也像思想复杂的调情老手得意洋洋地追述成长史），而是使用了在短篇小说中犹显珍贵的笔墨去描写俩人对革命偶像的崇拜以及大唱革命歌曲。因其并未滑入流俗，反而愈发真实。接下来笔锋一转，到了多年以后，当“我”在一次海外会议上再次遇到当年的少女时，她已经和“我”一样，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云雷也没有沿着作家的本能，去写乡村少年成长为知识分子的坎坷，以及“不忘初心”地坚守少年理想的执着。无论是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有经验的作家都会像长了副狗鼻子一样敏锐地、孜孜不倦地探寻“较劲”的地方，只不过探寻的方向各有不同。追求“好读”的作品会强调生活表层的冲突、纠葛、命运起伏，追求“耐读”的作品则会更强调人物灵魂深处的隐秘而微妙的变化——但两者存在着共同的风险，就是一旦开始“较劲”，往往用力过猛，就跟干旱地区的打井队似的，非把地球钻穿了算——从而让有经验的读者一眼看穿了作家的良苦用

心或云机心。而云雷却不同，他在交代两人的成长过程以及现状之时，都仅仅是基于“事实”的逻辑。一对少小离家、分散多年又偶然重逢的儿时伙伴在“最经常的状态下”和“最可能的状态下”应该是什么样子，他就处理成了什么样子，这甚至也不同于善于经营故事的作家们惯常用的另一个手法，也就是“留白”。留白是该“较劲”的地方故意不“较劲”，从而反倒使得小说的意味在读者那里被脑补得更加惊心动魄或者意蕴悠长，说到底还是在“较劲”，反其道而行之的“较劲”方法而已，而事实的逻辑则更为单纯、谦逊，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却也是更为自信，作家认为他所呈现的“材料”并不需要再做更多加工——无论是明的还是暗的、复杂的还是简洁的加工。事实的效果也是如此，《暗夜行路》这篇小说在作家所“需要”用力的地方几乎都未用力，但从通篇看来，却极其有力地凸显了作品的主题：理想主义或云“左翼思想”在今天的时代、尤其是今天的现实生活处境中是怎样得到传承的。试想这如果是一片经过了复杂设计、精巧编排的小说，还能够获得这样的效果吗？思想的主题很可能被淹没在故事的左冲右突之中。可以说，在《暗夜行路》这篇小说中，云雷以极度简朴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写作目标，他或许也明白，自己的写作目标只能用简朴的方式完成。而采用这种方法，在我看来既可能是一种精心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是性格的结果。云雷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写作选择，无论是在主旨上还是实现主旨的方法上。

同样，《三亩地》《界碑》等作品也都充满了简单、明亮而又

高度“真切”的气息。在发表《三亩地》的时候,《当代》杂志的洪清波老师说,这篇作品就是放进“纪实”栏目里也不会被读者看出破绽——那篇作品讲述了地主后代和祖上曾经拥有的三亩地之间的故事,以没有产权的产权意识呈现了不同中国乡村的前世今生,今夕何夕。后来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云雷,他嘿嘿笑着回答我:那真是小说。看到充满巧合与设计的作品,我们总会在潜意识里明确地告诉自己“那是编的”,随后对小说的评判会沿着一个惯性走下去,简言之就是看看作者编得好不好。而云雷的短篇小说打破了这个惯性,我们想要捕捉的是其中专属于“真”的感人与震撼之处。就像在多篇小说中出现的那个“我”,贯穿下来可以拼接出一个令人喜爱、亲切乃至敬佩的人物形象:他生于乡村,纯真烂漫,对身边的人与事充满善意;他背井离乡,懂得人生在世的坎坷与困顿,但从未因为那些坎坷与困顿生出对世界的攫取欲望;最令人感动的是,他永远念及着别人、与他同时代的千千万万的人所受的“苦”,因而“苦”没有磨灭反而滋养着他的那颗赤子之心——于是底色里反而浸润着一丝甘甜。我本人在写作的时候,也经常采用“我”这个第一人称视角,但那多是一种叙述策略,为了描摹世态,“我”有着多重身份,可以是文化混混儿,可以是理工男,也可以是懵懂呆傻的孩子,偶有和作者重合之处,立刻条件反射地虚与委蛇,再使个障眼法让人觉得“那不是我”。而云雷的那个“我”则更不像小说人物而像现实中人,他所看到的想到的经历的事情也就更“真”。因其太“真”,真得无视小说套路,以至于我一直怀疑云雷所写的乡村往事会不

会“果然是真的”。但即便作为朋友和责任编辑，我也并不想去询问云雷这样的问题，因为既然是小说，在事实层面追寻真假也就没有意义了——我一直觉得“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之类的声明对于小说这个文体是多此一举。而作为一系列具有无以复加的真实感的小说，我们应该探寻的也并非它们“说明了什么真实的事情”，而是它们“真实地说明了什么事情”。

这也就是要重新涉及云雷作为批评家的那一方面了。毫无疑问，批评家的身份使得他具有了一个长处，就是高度熟悉并且能够理性地看待小说作为一项艺术的种种门道。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云雷将他的小说写作和他在理论以及社会方面的思考相结合，试图解决一些对他而言、对许许多多从事文学的人而言更重要的问题。在一次和云雷闲聊的时候，我们都谈到了文学写作存在着这样一个难题，即“理念”在文学中的作用和处境：假如没有“理念”，那么作品纯然贴地，格调难以保证，但假如理念过强，理念先行，为了理念而写作，却反而会影响作品的表现力乃至艺术性。这其实是一个旧话题，但也是几乎所有从事写作的人永远都要面临的新话题。另一个问题则是：如果从十九世纪以来，小说存在着“理念”方面的某种普世的、一脉相承的渊源，那么基本可以确定是“人道主义”或云“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于是对于有着左翼思想背景的作家而言，他又如何寻找、构造出一种新的“理念”？这其实也是一个旧话题，并且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上经历了不太成功的尝试之后基本无人再提的话题，然而却是云雷依然持续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有着鲜

明倾向性的作家，云雷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程度也许超过了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因为中国的特殊历史，这种姿态在作家中并不多见甚至被视为雷池，以至于我们的同行在涉及日常生活的时候总能夸夸其谈，涉及历史判断和公共领域时却总是面目模糊，但恰恰因为中国的特殊历史，能够真挚地坚持某种倾向的人反而是格外值得尊敬的——但前提是真挚。而云雷以他独特的真挚，为他的思想背景、理论倾向找到了一条写作上的出口。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种推测，云雷希望通过短篇小说的写作来延续、丰富、完善他在“底层文学”乃至整个左翼文学层面的思考，他试图通过“真切”和“亲历”这种化繁为简、化巧为拙的写作策略来实践他的上述思考。当然，作为一种写作策略，它的最大价值也许不在它本身，更不在于这种策略是否最终被证明成功，而在于：作家为何必须去寻找这样一种策略。